

丘处机《磻溪集》、马祖常《石田先生文集》与虞集《道园类稿》三种

王 玉 良

丘处机《磻溪集》三卷

《磻溪集》三卷，金刻本。作者丘处机（1148—1227），字通密，号长春子，山东栖霞人。全真道北七真之一，《元史》有传。

全真道是金代逐渐兴起的道教新派。创始人王喆，原名中孚，陕西咸阳人。原为儒生，后又应武举，中甲科而不被录用，遂弃家人终南山修道。号重阳子。金大定六年离陕到山东宁海（今牟平）一带传道。首立三教平等会，教人讽诵《孝经》、《心经》、《老子》等三教经典；后又提倡出家修炼和济贫拔苦等一套全真道教义。丘处机十九岁，自栖霞至宁海昆崙山拜王重阳为师，学全真道，成为王的高徒之一。

大定十年（1170）王重阳卒于汴梁，丘处机等扶丧归葬咸阳故里刘蒋村。处机在墓旁结庐守制。服除，即云游秦陇山川名胜，居磻溪（在今陕西宝鸡市东南，相传为姜太公吕尚垂钓之地）和龙门山（在今陕西韩城县境）读书、修炼、传道十余载。据说他夜不入寐，日记三千言，三教九流贮蓄于胸臆。创立了全

真道龙门派。因此声望日高，四海重名。大定二十八年到燕京受到金世宗的召见和赏识。以后回到山东，居栖霞、莱州等地。处机喜吟诵，所著词诗歌曲，或叙事状物，或歌咏性情，自然豪放，寓意哲理，寄托幽旷，多有可观者。其徒袁为《磻溪集》三卷。“集中咏磻溪者凡十数见，盖因喜其地幽胜，久而不忘，故题集名以寄意耳”①。此集是研究丘处机六十岁以前行踪事迹和思想情怀的宝贵资料。

元太祖二十三年（1227）七月处机病卒，年八十。遗骨葬今北京白云观邱祖殿。处机入元以后的事迹，详其弟子李志常所撰《长春真人西游记》。书中收录处机所作诗词甚多，可为《磻溪集》续篇。

金刻本《磻溪集》三卷，框高21.8厘米，宽15.3厘米，半叶九行，行十七字，白口，左右双边。版刻字体遒劲端严，版式疏朗大方，白麻纸，淡墨印。首存大定丙午（1186）五月中条山玉峰老人胡光谦序，为半叶七行，字仿颜体，行书大字。凡语涉金帝处，皆提行空格。存有目录，诗词按体编排，卷一七言律诗及绝句；卷二古体诗及五言绝句；卷三词。共收四百五十余首。诗中记事至大安元年（1209），刻梓亦当此时，确为金刻无疑。

本书铃印计有：“沈与之印”、“姑余山人”、“毛氏子晋”、“汲古主人”、“乾学之印”、“健庵”、“东郡刘喜海燕庭所藏”、“竹铭”、“世杰”、“澂园”、“藏园秘籍孤本”、“沅叔心赏”、“忠谟继鉴”等。可以考见曾历藏明沈氏野竹斋、毛氏汲古阁及清徐氏传是楼、刘氏味经书屋等处。但查汲古、传是等家书目，均不见著录此书，真可谓极罕秘之本了。民国己未（1919）傅增湘先生在北京带经堂书坊购得之，视为秘宝。解放后，此书随傅氏大批藏书一起捐献北京图书馆。

此书前册末有寐叟（沈增植）跋语。扉页有傅增湘长跋一通，于此书考辨甚详，足资参考。傅氏又于《藏园群书经眼录》

中著录此书云：“按此集正统《道藏》分为六卷，实就此三卷本析之。惟卷三、四次第略有参差耳。诗皆入元以前所作。取《道藏》本校之，于篇章初无增损，而字句大有差殊。诗句下原附音释、自注，词下所著原名，《道藏》本多删落。诗词下偶有小序，可以考见生平及游踪者，《藏》本亦加删节，均赖此本校补。”又校出金刻本卷三《沁园春》原为六首，第五首为《赞佛》，《道藏》本惟将此首有意芟薙之。

按明正统《道藏》之《磻溪集》六卷编入太平部友一至友六。明《道藏》实以元《藏》为祖本，而元刻《道藏》亦与丘处机有直接关系。据陈国符《道藏源流考》引《终南山祖庭真仙内传》卷下载：“按披云姓宋讳德方，字广道，莱州掖县人。元初遵其师丘处机之遗意，于太宗九年（1237）倡刻《道藏经》。令其弟子秦志安于平阳玄都观总领其事，至乃马真皇后称制三年（1244）全《藏》刊竣”。可见《道藏》本《磻溪集》的析为六卷和内容的删改，均出丘处机弟子之手。《赞佛》一词的芟除，透露了元初释道两教争斗的信息。

丘处机的著作，清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载有：《长春子藁》口卷，《磻溪集》六卷，《大丹直指》二卷，《青天歌》一卷，《鸣道集语录》一卷。另外，《四库全书总目》道家类存目著录丘处机撰《摄生消息论》一卷；南京图书馆藏有清抄本《磻溪词》一卷。

现存正统《道藏》本《磻溪集》卷首除胡光谦序外，尚有大定丁未（1187）文林郎前太常博士兼校书郎云骑致仕平阳毛麾序、泰和丙寅（1206）昭义大将军武定军节度移刺霖序和泰和戊辰（1208）安东陈大任序。此金刻本因流传久远，三序均付阙如。另外正文亦间有缺叶、缺字或板印不清等情况。但此为天壤间幸存之金刻孤本，保存了原刻风貌和许多珍贵资料，对于研究丘处机和道教的学者来说，却有着很高的参考价值。

马祖常《石田先生文集》十五卷

马祖常（1279—1338）字伯庸，别号石田，元代著名文学家。其先世为雍古部族，原居天山，曾先后服属辽、金。成吉思汗统一北方各部，遂并入蒙古。其姓氏来源于高祖锡里吉思（《四库总目》谓应为锡里济苏）在金季曾为凤翔兵马判官，死节、赠桓州刺史（见许有壬《马文贞公神道碑铭》）。子孙因以官为马氏。入元后，曾祖月合乃（《元史》有传）。从元世祖征宋，徙居汴梁，累官至礼部尚书。祖世昌，行尚书省左右司郎中，赠嘉议大夫，吏部尚书。父润，历官同知漳州路总管府事，赠中奉大夫，河南行省参知政事，家于光州（今河南潢川），遂为光州人。

祖常出生于数世勋阀，久居中原之家，自幼读书习儒。以西裔于延祐二年（1315）参加右榜河南乡贡及会试，皆为第一，廷试第二。被授应奉翰林文字，擢监察御史。他荐贤拔滞，知无不言，尝劾罢权相。共历官五朝，其在礼部为尚书，在中书为参议，在御史台为治书侍御史中丞，在枢密为副使。累阶要官，颇有政声。以病归光州，于后至元四年（1338；《四库总目》误为至正四年）卒，得年六十，谥曰文贞。

祖常工于文章，专以秦汉为法，行文流畅精核，务去陈腐，在元代自成一家之言。诗则与袁桷，虞集等相倡和，亦赫然有名于当时。有诗文集十五卷，为祖常卒后一年，即至元五年九月由淮北江东道廉访使苏天爵呈请于朝，按元代文臣先例，由宪司差人抄录其诗文，主要为祖常从弟易朔及苏天爵整理編集，发下扬州路儒学刊板以传。此即为现存孤本之元至元五年扬州路儒学所刻《石田先生文集》十册（卷二至三、十四至十五抄配）。

此书框高二二。九厘米，宽一五。六厘米。半叶十行，行十

八字，黑口，左右双边。大版心，上记字数，下口间有刻工姓氏。计有：王君用、王文、子明、仲明、胡、杨、陈、史、娄、羊、廉等。字体仿赵松雪，刻印极精美，在元刻书中实为不多见之最上品。卷首有至元五年王守诚、陈旅、苏天爵三序，叙刊集经过及知遇之感；而于祖常诗文推崇备至，谓使元文风气为之一变，后生争相效慕之。

书中钤印有：“元本”、“汪士琛印”、“士钟”、“閩源”、“骏昌”、“雅庭”、“平阳汪氏藏书记”，“郁松年印”、“泰峰”、“姑苏城外人家”、“安贫乐道”、“丽文”、“大梁邢氏”等。知为清代著名藏书家汪士钟家之故物。几经流传，二十年代为张允亮（庾楼）所藏，后转归天津周叔弼先生，周先生倩徐宗浩抄补缺卷，使成完书。解放后捐献给北京图书馆。

明弘治六年熊翀尝刻《马石田文集》十五卷，为十行二十一字，大黑口，四周双边。该书卷首亦刻有王守诚、陈旅、苏天爵三序及牒文。若弘治时之序文丢失，极易错认为元本。考清代瞿氏铁琴铜剑楼等藏书家书目著录之元刻者，实皆为明弘治六年熊翀太原刻本。民国壬戌（1922）上海古书流通处影印之元刻本《元四家集》，其第一种《马石田文集》亦为明弘治之本。可见元刻《石田先生文集》盖不为世人所知。北京图书馆所藏明刻《马石田文集》，首有弘治癸丑春正月壬辰赐进士出身中顺大夫太常寺少卿兼修国史长沙李东阳序，卷末有同年七月张颐撰《题马石田文集后》及熊翀撰《书重刻马石田文集后》二篇。熊跋云：“……恨其全集之未见，访诸乡故老，历十余年始得钞本于亚卿□公家，如获拱璧。后官御史，出按甘肃，又得见公之裔孙马铁牛，持公所撰母夫人石刻《墓铭》来，……乃手录其母夫人《墓铭》附集中，而并录虞伯生撰述其先《桐乡阡表》及许有壬所著公《墓碑》，录于集尾……每公暇辄自校讎，又逾年，而始克终

编，爰捐俸募工刻于太原府学宫”。

兹以元刻本与明弘治本篇目相校：明本卷四缺《瘦马图》一首；卷八正文缺《石田山房记》一篇，而编入附录中；卷十缺《重修通济渠龙祠碑铭》一篇。两元本校明本正文少收诗五首：卷二《古城熊翁寿考》，卷三《菊枕》、《琉璃簾》、《野兴》，卷四《暑雨》；文四篇：卷八《州判张君去思记》、卷十三《故显妣梁郡夫人墓誌铭》、《勅赐御史中丞赵公先德碑铭》、《显妣梁郡夫人杨氏墓誌铭》。元刻本无附录，故又缺附录中之《桐乡阡表》及《马公神道碑》两篇。1923年（癸亥）傅增湘曾以元本与影印明本通校一过，称“改正不可胜计”。

祖常尝预修《英宗实录》，译润《皇图大训》、《承华事略》以及編集《列后金鉴》、《千秋纪略》等书，熟知元代旧章典故，所以从他的诗文中不但可以使我们鉴赏元代名家的文学作品，而且其中蕴藏着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对于元代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研究颇具参考价值。此书已列入国家影印出版计划，编入《古逸丛书三编》之中。

虞集《雍虞先生道园类稿》五十卷

虞集(1272—1348)字伯生，号道园，因尊崇宋儒学大师邵雍，名其书室曰“邵庵”，人亦称邵庵先生或雍虞公。祖籍四川仁寿，世为南宋名宦。宋亡，父汲迁家江西崇仁，以翰林院编修官致仕。

集幼承家学，长受业于父友吴澄。大德初至大都（北京），被荐授国子助教。仁宗时升集贤修撰，泰定帝拜翰林直学士兼国子祭酒。至文宗时，迁奎章阁侍书学士。尝奉命与赵世延等采辑本朝典故，仿《宋会要》例纂修《经世大典》，书成，凡八百帙。晚年以目疾，回归江西故里。至正八年(1348)五月病卒，年七十七岁，諡文靖。

元仁宗即位以后恢复科举，选用儒生。于是四方俊彦，萃于

京师。集以博学宏才，实为文坛宗伯。其文章法度谨严，辞指精覈，一时宗庙朝廷之典册，公卿大夫之碑版，多出其手。其诗作更是权奇飞动，境趣天生，与杨载、范梈、揭傒斯齐名，并称虞杨范揭，而集之声望影响更为卓著。生平著述殷富，所作诗文无虑万篇。元代刻梓以传者，计有诗文集《道园学古录》五十卷，《道园类稿》五十卷；诗集《翰林珠玉》六卷，《道园遗稿》六卷，《伯生诗续编》三卷等五种。其中《道园学古录》元至正元年福建刻本已不存于世，流传本有明景泰七年郑达黄仕达刻本及明嘉靖四年陶谐虞茂刻本等，均为翻刻建本。《道园遗稿》六卷，尚存元至正十四年金伯祥刻本。《翰林珠玉》六卷，亦存元孙存吾家塾刻本。此二书傅增湘先生均已覆刻编入《蜀贤遗书十二种》中。《伯生诗续编》三卷，北京图书馆藏有元至正六年刘氏日新堂刻本，罗振玉曾影印收入《芸窗丛刊》。惟元刻本《道园类稿》五十卷，明清两代既无重刻，亦鲜为人知。《四库全书总目》亦未见著录。

北京图书馆现藏有《雍虞先生道园类稿》五十卷元刻本两种。

其一为元至正五年抚州路儒学刻本，此书框高二十二厘米，宽一四.三厘米，九行二十字，黑口，四周双边。卷首有至正六年二月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欧阳玄序，称：“太史夏台刘君伯温，蚤岁鼓篋从公成均。及为江右肃政使者，近公寓邑，乃哀公之文，将传诸梓。书来京师，属玄为叙”。又有至正五年五月江西湖东道肃政廉访司牒文一道，内称：“准本道廉访使太中牒……伏覩前翰林奎章学士资德大夫虞集，闕阅名家，久居禁近，以文章道德黼黻皇猷，后韩子而继出者，士论有所归矣。其所著诗文若干卷，前福建闽海道廉访副使幹玉伦徒，已尝命有司锓梓。然字画差小，遗逸尚多。抚州路乃本官寓间之地，如蒙移文本路详加编录，大字刊行，岂惟可以为法后学，实足以彰国家制作之盛”，后署“大中大夫江西湖东道肃政廉访使沙刺班”等衔名八行。牒文后又有抚州路总管詹天麟、经历黄天觉

跋称：“宪司牒文具录如右。切惟监宪公嘉惠后学，表章斯文。宪使、宪副、宪金诸公道同志合，相与署牒，刻之临川郡学。而宪幕经历东平司君执中、知事河中张君允中、照磨保定崔君文翼，协赞以成其美焉”。

以上三段文字基本上讲清了此书刊刻的缘起和时间、地点等问题，但前人对欧序中所说的刘伯温其人曾发生疑议。经钱大昕等考证，此刘伯温即为太中大夫江西湖东道肃政廉访使沙刺班之别名。此公系河西唐兀氏人，历任监察御史、江浙行省左右司郎中，并曾参修辽、金、宋三史者。按《道园类稿》卷五有《次韵刘伯温送王止善员外诗》四首；卷八有《题刘伯温行卷》、《谢刘伯温》；卷十五有《刘伯温画像赞》；卷十九有《刘公伯温学斋吟稿序》等，证明其与虞集过从甚密、而非青田刘文成公。

此书系京师图书馆旧藏，书中没有任何公私藏书印鉴，或为清内阁大库中残书。现存三十八卷：卷一至二十、二十五至二十七、三十三至四十三、四十七至五十。各卷亦间有缺叶或破损等情况。

其二为元末翻刻抚州路儒学本，此书旧签题“道园类稿五十卷，元至正刻本，真定梁氏藏，凡六函三十六册”。民国二十四年傅增湘购得，解放后捐献给北京图书馆。傅先生附纸跋文称：

“此书余购自文德堂韩大头。缺第十七至二十，凡四卷。据北平馆藏元刻残本照钞补完。各卷钤有：濮阳李延相书屋记、梁清远印、述之、梁先植印、西邨书隐、字奋修号牧夫、耿文光印、星垣各印。顷见董授经所藏，纸墨视此为精，乃有蕉林梁氏印。此刻极罕秘，而昆仲聚于一门，亦足异矣。藏园记乙亥二月”。另外此书首册封面尚有清耿文光题识：“道园类稿行本甚多，此本元刻元印，求之数年，始得以卅金购之，甚不惜也”。以此本与州原本相校，除卷首欧阳玄序之字体行款不同外，其余版式字体基本相同。如卷九为五言绝句，抚州原本目录误刻“绝句七言”，此本亦照刻不改。所收内容抚州本卷二十六多《抚州路崇

仁县新置济平仓记》、《临江谈氏孝节祠堂记》二篇；卷二十七多《齐庆堂记》、《具庆堂记》、《萱寿堂记》三篇。而此本卷二十七增刻《寿玉堂记》一篇，其他无异。

虞道园为元代文学大家，此《道园类稿》所收皆其精要之作，且为前人罕觐之元刻秘本，对于我们今天研究整理和校勘出版虞集的诗文，当是极为难得的重要资料。

注①傅增湘金刻本《磻溪集》跋语。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

北京云居寺的契丹大藏经

1974年在山西应县佛宫寺辽代建筑的释迦木塔中，发现了辽代南京印经院刻印的十二卷契丹大藏经的残本。这是早已失传的珍本。

在北京云居寺的一万四千多块石刻佛经中，人们发现有一部辽代刻的契丹大藏经，十分完整，用汉字书写，字体工整，行格疏朗，排列整齐，版式统一，校刻甚佳。与应县木塔中发现的契丹大藏经相对照，两者同出一源。

公元947年，辽大同元年，太宗耶律德光建国号大辽。辽建国以后大力汲取中原文化，崇信佛教，在当时的京都南京（即今之北京）建设寺庙，修筑佛塔，大力宣传佛教，刻印佛经。契丹大藏经就是在辽代的京城——南京刻印的。应县木塔和北京天宁寺塔、良乡昊天塔、云居寺的镇经塔、戒台寺的普贤塔等，都是辽代修建的。应县木塔中发现了辽代南京印经院印在黄纸上的契丹大藏经十二卷残本，云居寺石洞内发现了辽代僧侣刻在石板上的佛经《契丹大藏经》。这说明两处发现的契丹大藏经是出自同一个版本。

契丹大藏经的发现，对于研究辽代历史、政治、经济以及佛教发展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王铭珍 •